梁啓超與討袁護國

胡平生

引言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是中國近代史中的風雲人物，他的一生多彩多姿，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就拿他的從政生涯來說，固然爲時很短，却不乏值得稱述的事功。這是因爲他熱情洋溢，愛國心切，不僅以政談家自居，坐而論道；必要時也能罔顧轍牲，奮起行動；像清末的戊戌變法、民四、民五的討袁護國、民六的戡定復辟，他都躬與其事。其中尤以在討袁護國期間的表現最具影響力，他非但運籌帷幄導引護國之役的發動，並且不避艱危，毅然潛赴廣西，間接關係到廣西的獨立，復在他精心擘劃、奔走號召之下，設置了獨立各省的聯合機關——軍務院，以統一事權，集中力量，終使帝制瓦解，共和復甦，功在國家，足稱不朽。然而任公卒後，主政當局對他討袁的勳績，並無隻字片言的褒揚，[1]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少之又少，殊令人感慨不已！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即在實事求是，把任公從事討袁護國的經緯和貢獻，作一番有系統的編述與申論，或能藉此略見任公在民國政治上所應該居有的地位。

由擁袁到反袁

梁任公雖自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以後不談革命，而專心致力於君主立憲的鼓吹，但是他早年曾對民主共和頗有好感，他在光緒二十九年撰寫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說：「吾心醉共和政體也有年。」祇是他熟讀法國大革命史等書，深恐共和變質，「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2] 他更認爲贊成共和的革命黨，態度過於激烈，以當時內憂外患，搖搖欲墜的中國，實不堪再事破壞，不如用溫和的手段，就中國的現狀加以改革，所以他很沉痛地表明他的苦衷說。

> 夫鄙人之爲此言，誠非有所愛於滿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論之，鄙人雖無似，抑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血溢湧。……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聞發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國，而並可以復仇者，

[1] 左舜生先生就曾經感慨系之地說：「任公卒後數年，國民政府曾有褒揚令之頒布，但令文專就其講學誘掖後進立言，於民五、六兩度維護民國之功，乃隻字不及，不知令稿出於誰氏之手筆，果置事功不談，而專言學術，則嚴又陵、王靜安輩之可褒揚者，又豈在任公下乎？是知黨見中人之深，雖至今猶無藥可醫也。」見左舜生：**文藝史話及其批評**（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九年初版），第二集，頁三七。

[2]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九年臺一版）之十三，頁八五。

鄙人雖木石，寧能無歆焉！其奈此二者決不能相容，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則必至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痛，而必不願爲亡國之罪人也。」[3]

直到民國元年二月清帝退位，共和體制已然確立，他才放棄君主立憲的說法。任公的轉變，當然與他「流質易變」的性格有關，加以他此時正值四十歲的盛年，在思想上不致冥頑不化（康有爲便與任公不同，仍然持其保皇主張），見共和已成定局，便不再持異說，而轉求在現行國體之下，致力於政治上的改良，正如他日後所稱的：

吾以爲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爲君主爲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爲君主爲共和，皆不可也。[4]

據梁任公分析，民國肇造，國內的勢力有三大流派，一爲舊官僚派、一爲舊立憲派、一爲舊革命派。[5]他自己當然是屬於舊立憲派。就態度而論，舊官僚派是保守分子，舊立憲派與舊革命派同屬打破現狀的改革分子，但是在執行方式上有溫和與急進的顯著分別。舊立憲派介於兩大之間，應該採取甚麼態度？任公曾訓示同仁說：

吾黨一面既須與腐敗社會（按指舊官僚派）爲敵，一面又須與亂暴社會（按指舊革命派）爲敵。彼兩大敵者，各皆有莫大之勢力，蟠亙國中，而吾黨以極孤微之力與之奮鬬，欲同時戰勝兩敵，實爲吾力之所不能逮，於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戰其一。……先注全力以與抗，而與第二敵，轉不得不暫時稍爲假借。……革命之後，暴民政治最易發生，而暴民政治一發生，則國家元氣必大傷而不可恢復。……不得不先注全力以遏亂暴派之謀破壞者。[6]

清末以來，任公與革命派的仇隙已深，辛亥革命成功後，革命派挾勝利的餘威，又處處排斥立憲派，任公等人遂認革命派爲亂暴分子，難以共圖大業，轉與舊官僚派暫相合作，來對付革命派。而任公所謂舊官僚派的領袖，正是當時的大總統袁世凱，由此不難想見任公擁袁的動機與苦衷。民國二年五月，進步黨以舊立憲派分子爲主體宣告成立，極力交好袁氏，打擊舊革命派蛻化而成的國民黨，便是任公這種政策付諸實行的有力明證。

任公擁袁的另一個原因，便是太過於信賴袁氏的能力。他與多數中國人民一樣，對袁氏抱有兩種相同的看法：「其一曰，在袁氏統治下之中國，其能進步與否雖不敢知，然苟無袁氏，則中國現狀且不能維持，前途更何堪設想；其二曰，袁氏之爲人，不能使人滿意固也，然國中能與袁氏代興者果何人，其人是否能優於袁氏。此兩種感想者，非

[3] 梁啓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飲冰室文集之十九，頁四三。

[4]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談話，民國四年九月四日申報」，轉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初版）下册，頁四五八。

[5] 梁啓超：「民國元年二月廿三日致袁項城書」，同上書，頁三八二。

[6] 梁啓超：「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飲冰室文集之三十，頁二〇——二一。

惟外國人共有之，吾國人亦多有之，即鄙人數年來亦以懷抱此種感想之故，乃不惜竭吾才力，且犧牲一切，以謀輔翼袁氏。」[7] 任公雖然不盡滿意袁政府的種種措施，但是顧及中國正「處列强環伺之衝，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則瓜分之禍，即隨其後。」何況「當此存亡絕續之交，有政府終勝於無政府。」是故，任公認爲對袁政府「只當嚴重監督，而不必漫挾敵意。」[8]

民國二年五月至四年夏天，是任公等進步黨人擁袁最力的時期，其間任公先後出任袁政府的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總統府政治顧問等職。他回憶「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着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9] 吳稚暉曾批評進步黨的錯誤，十分中肯，他說：

> 進步黨的錯誤，他是一方反對守舊黨，一方抑遏急進派，他以爲這便是行我中庸之道的方法。其實官僚有四千年的傳統，勢力雄大，要想化官僚，結果終是官僚化。急進派有世界革命之背影，亦非抑遏可以消滅。官僚柔而急進剛，不勝急進之窘迫，往往便與官僚妥洽，有時還進一步，竟助官僚以撲急進，於是鷸蚌相持，官僚之漁翁，坐奏兩凱。[10]

有人因此誤認進步黨爲袁氏的御用黨，這眞是不能明瞭任公欲以民主憲政救國的苦心。任公實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譬如他主張中國應有兩大政黨，一黨在朝，得國會的支持，組織强有力的政府，一黨在野，負監督的責任，互相制衡。兩黨在朝在野的位置，可視人民的支持(投票)而轉易。他自己頗想立於監督的位置，來指導袁世凱改革政治，祇是任公過於坦率天眞，未能認清袁氏私心自用的眞面目，反爲袁氏所愚。對這件不光彩的事任公頗感痛心疾首，民國十年他有「外交歟內政歟」一文說：

> 因爲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做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11]

任公警覺袁氏帝制自爲的野心是在民國三年年底。是時袁氏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任期十年，連選得連任），在此以前，已經廢止國會，改國務總理爲國務卿，設政事堂，種種復古的做法，使任公感到「袁世凱的舉動越看越不對了。」[12] 四年正月，袁克

---

[7] 梁啓超：「袁世凱之解剖」，飲冰室文集之三十四，頁一〇——一一。

[8] 同註[6]。

[9] 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八八。

[10] 吳敬恆：吳稚暉先生文粹（臺北，京華書局，民國五十七年初版），第一册之一，頁三二〇。

[11] 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七，頁五九。

[12] 同註[9]。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楊度邀宴任公，席間「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任公「知禍將作。」[13]於同年六月間隨馮國璋入京勸告袁氏，袁氏痛切否認，態度誠懇，使任公眞以爲袁氏絕對沒有稱帝的野心。直到八月中旬，楊度等「六君子」的籌安會宣布成立，任公才恍然大悟，知道袁氏已不可救藥，儘管袁氏欲以二十萬元鉅款收買任公，任公也嚴辭拒絕遂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發表，駁斥帝制。任公反袁的動機，主要是袁氏的做法，已到使他忍無可忍的地步，據劉以芬說：

> 進步黨自創黨以來，其所取政策，卽係與現有勢力相結合，意欲乘機而指導之，改造之，使成爲我國之中堅力量，以求安定一時之社會秩序，並徐圖發展。故彼之所謂結合，亦有其一定限度，與一味附和者不同，苟一旦越此限度，則彼卽不能不顧及自己之立場，而立與離異。[14]

進步黨是一個溫和的政黨，任公屬於溫和型的知識分子，[15]保守性重，妥協性大，凡事不易走極端，但並不沒有原則的，當袁氏帝制野心未公開之前，任公極力設法挽救，寄望袁氏能及時悔悟，等到袁氏背叛民國已成定局，便不再遷就附和。民國四年的冬天，他曾經很沉痛地向友人說：

> 吾黨夙昔持論，厭畏破壞，常欲維持現狀，以圖休養，今以四年來試驗之結果，此現狀多維持一日，則元氣多斲喪一分，吾輩擲此聰明才力，助人養癰，於心何安？於義何取？使長此無破壞猶可言也。此人（按：指袁世凱）則旣耄矣，路易十四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旣無可逃，所爭早暮已耳。[16]

任公這段話很清楚地勾畫出他對袁氏失望、唾棄的心理。至於任公所持的反袁理論，仍然是關於「國體」、「政體」的幾句老話，却能言之成理。今摘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中一、二字句（原文甚長，近萬言），可略見任公對他「維護共和」所作的解釋：

>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以生平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如鄙人者，曷爲當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張變更國體時（按指辛亥革命）而嘵嘵取厭，當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復嘵嘵取厭。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恒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

---

[13] 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臺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年臺一版），頁一四三。

[14]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民國六十年出版），頁二四。

[15] 張朋園：「進步黨——兼論清末民初溫和型知識分子的來龍去脈」，**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一)**（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民國六十年出版），頁二八八。

[16] 梁啓超：「致籍亮儕、陳幼蘇、熊鐵匡、劉希陶書」，盾鼻集，頁二七——二八。

論同斯職志也。[17]

此文一出，以任公的聲望、文采、對當時人心着實發生很大的影響。吳貫因曾親見任公這篇文章的原稿，謂其中尙有「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18]的語句，有人勸任公說袁氏尙未有承認帝制的行動，初商政見，似不必如此激烈，任公乃將此段刪去，其餘各段也改得比較和緩，然後再發表於京滬各報。可見任公反袁的堅決態度。此後任公乃開始積極進行起兵的計劃，而進步黨要人湯化龍、徐佛蘇、湯叡、藍公武等均翩然辭職，與任公一致行動，加入護國討袁的行列。

導使護國之役的發動

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等發表「籌安會」宣言後，袁氏帝制的進行已日趨明朗。進步黨乃以梁任公爲中心，在天津密商討袁大計，參與其事的尙有蔡鍔、湯叡、蹇念益、陳國祥、徐佛蘇、戴戡、王伯羣諸人。其中蔡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是任公光緒二十三年在長沙時務學堂執教時的學生，其後經任公的提携，前往日本士官學校習學軍事，辛亥革命之際，蔡鍔被推爲雲南軍政府首任都督，至民國二年十月始離滇赴京任職。當籌安會發表宣言的次日，蔡鍔卽由北京搭晚車至天津，邀請任公到湯叡家中商量了一夜。[19]任公等人決定唯一可行的便是依恃蔡鍔在滇、黔兩省的舊勢力來討伐袁氏，任公並指示蔡鍔說：

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爲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20]

蔡鍔回京後便積極佈置，暗中與雲南方面聯絡，待任公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駁斥帝制，蔡鍔就極力韜光隱晦，怕引起袁氏的猜防。例如當袁氏的黨羽手持帝制意見題名簿向他試探之際，他毫不猶豫立卽大書贊成，同時並代蔣方震、蔣尊簋簽寫贊成的字樣。[21]此外，他逢人便說「梁（任公）先生是書獃子，不管事實，祇顧空論。」[22]表面上裝着與任公分手的樣子，並且故意沉迷於酒色，以避人耳目，他與雲吉班妓女小鳳仙之間的韻事，便是這段非常時期內發生的，梁任公曾替蔡鍔解釋說：

---

[17] 盾鼻集，頁九七。

[18]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五七——四五八。

[19] 同註[18]。

[20] 「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頁一四四。

[21] 雷飆：「蔡松坡先生事略」，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第三册，頁四一四。

[22] 梁啓超口述，周傳儒筆記：「蔡松坡遺事」，載蔡松坡十年周忌紀念特刊（北京，晨報社，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松坡因爲派了許多人到雲南去，一切的通信機關都設在我家裏，不能不常到天津來，然而僕僕往來，最惹注目，祇好裝着一個腐敗的樣子，打牌、吃花酒，樣樣都幹，後來報紙上說他同小鳳仙如何如何，這類事情，誠然是有些影響的，因爲他每次到我家裏來，常常帶起妓女在一塊，打牌打個通宵，到了酒闌人靜，才能商量正事。[23]

至十一月中旬，蔡鍔很機警地罷脫袁氏密探的監視，乘隙潛離北京，[24] 避往天津租界。十二月二日蔡鍔從天津啓程赴日，臨行時與任公殷殷話別。蔡鍔抵日不久，卽乘船南下，經由香港偕同戴戡、殷承瓛等人，於十二月十九日潛抵雲南昆明。任公也辭職離津，於十二月十八日行抵上海，欲就近遊說對袁氏帝制持消極態度的江蘇將軍馮國璋，以響應雲南方面將發的討袁行動。

按照任公與蔡鍔等人在天津所議定的計劃，是在蔡鍔抵滇後，先從雲南潛運軍隊到四川佈署妥當，然後滇省再宣佈獨立，使四川的袁軍措手不及，而乘此一鼓作氣掃平川境。故十二月二十一日任公在上海得蔡鍔的函電，謂前隊將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由滇出發赴川，預定二十天之後再發表滇省獨立的通告。可是在公卽以「別種理由由南京發一電促其早發，」[25] 致使雲南方面變更計劃，提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電獨立。任公這封通電竟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量，且任公身在上海，電報却是由南京發出，實在令人不解。關於任公所謂的「別種理由」，任公在日後也不加以闡釋，然陸丹林的「革命史譚」對此有詳細的說明，這是參加護國之役的韋君告訴陸的一段珍聞：

馮國璋那時是江蘇督軍，馮的祕書長黔人胡嗣瑗，原屬滿清翰林。辛亥革命後，自命爲遺老。後來得人介紹，貪緣馮任祕書長，兼金陵道尹。馮事無大小，倚他如左右手。民四夏間，馮保薦他巡按使記名，怎知袁氏不准。胡抱恨在心，常常想找機會報復。恰值張勳的顧問潘若海，常奔走徐州寧滬間，從事各方聯絡，和胡是文字知己，彼此同情反袁。……梁（啓超）到上海後，潘以同鄉關係，特往訪梁。雖知梁與蔡鍔有密謀，但未知底蘊。於是設法向梁探索根源，而對梁說：

---

[23] 同上。

[24] 蔡鍔出京的經過，蔡本人、以及梁啓超都沒有留下可資參考的記述。護國之役結束後，蔡鍔成爲名震天下的英雄，世人遂繪影繪形，大肆喧染他潛離北京的事蹟，如天懺生：**蔡松坡軼事**（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國六十年出版）、楊佛士：「記蔡將軍出京事」（**組織**，第一卷第九期，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非非：「蔡松坡金蟬脫殼記溯源」（成都，**新民報晚刊**，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缺名：「蔡鍔遺事」（**王曲**，第十卷第三期，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等，均係道聽途說，不足採信。關於蔡鍔出京最詳盡、最平實的記載，應推哈漢章的「春暉筆錄」，他與蔡鍔爲至交（日本士官學校前後期同學）、又曾目睹蔡鍔出京前夕的種種行動，他的回憶自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因哈文甚長，茲不在此引錄，可參見劉成禹：**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臺北，文海出版社，**袁世凱史料彙刊本**，民國五十五年初版），卷二，頁四——五所轉載的「春暉筆錄」。

[25] 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頁二八。

「馮華甫（國璋）是反對帝制的，不過因和袁歷史較深，不便發難。倘有別人首義，他必響應。可惜袁現在已偵悉馮的舉動，內調爲參謀總長，不日離寧，失了固有地盤，難以附義。事已危急，刻下還無陳涉、吳廣的人們，實在可惜！」那時，梁一時不察，竟信爲事實；且憶及那年秋天、和馮相見、談及帝制時，馮也微露反對。前因後果、信之不疑。於是把倒袁計畫告潘，並請潘在南京代爲收發密電。潘均答應，過了幾天，梁已接到南京復電，說一切照辦。……原來當時的一般軍閥，自己一向不看公事，任由祕書長判行，故在上海，潘與梁所談和南京代表發出一切祕電、馮均未之知，只是胡（嗣瑗）藉此發洩報復袁氏之不肯准他巡按使記名的憤恨。[26]

上述這段記載十分重要，它不僅導致了護國之役的提前發動，而且對蔡鍔征川的軍事影響也非常大，故不嫌其冗長而選錄之。另外，任公的好友黃羣（溯初），當日曾代表任公聯絡馮國璋，奔走於上海、南京之間，他分析潘若海、胡嗣瑗代任公發密電的原因，正可與陸丹林所記的那段珍聞對照，俾能更接近眞相，按黃羣的記載說：

胡晴初名嗣瑗，貴州人，前清翰林，光緒末年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調查局總辦，其時弟(黃羣自稱)亦在該局辦事，故與胡有舊交也。晴初於復辟之役，爲著名之復辟派，即其熱心推到項城，正爲其圖謀復辟之初步，弟與同人當時已知其意，故吾人之託胡與之肯受託者，實有交相爲用之意也。潘若海似與胡同宗旨，彼等反對項城全屬自動，且恐吾人或不反對，而使彼等失其助力，蓋其倒袁之動機，與吾人大不相同也。任公與若海有舊，似係康門關係，（原注：此係推測，仲策當知其詳），而與胡不過彼此相知耳。當時任公與胡之關係，若海牽線，若海亦當時馮之幕友也。惟胡爲馮之祕書長，頗有實權，其經手代任公所發之電，頗有爲馮所不知者，後聞任公第一次致松坡之電，似馮未之先知，而爲胡所代發者之一也。……馮之內心固爲反對帝制，贊同起義，然因種種關係，致其態度頗不顯明，究竟不免略帶觀望色彩。[27]

以馮國璋的聲望、實力，在當時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因此，任公千方百計想說動馮舉兵，潘若海、胡嗣瑗都是復辟派分子，也唯恐袁氏不倒，故誑騙任公，誘使雲南首義早日發動，聲討袁氏。任公對潘、胡的欺詐行爲耿耿於懷，怨憤不已，據任公的友人何翽高在「六十自述」中說：

雲南起義後，岑（春煊）、梁（啓超）入肇慶，籌設軍政府，電招余與（溫）毅夫至端溪書院，探詢馮（國璋）、張（勳）態度。夜與任甫（任公別號）對榻談，

[26] 陸丹林：革命史譚（南京，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六年再版），頁六六——六八。

[27] 黃羣：「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致(丁)在君先生書」，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七〇——四七一。

（任公）縷述蔡松坡京津密謀，歸咎（潘）若海、琴初（晴初、卽胡嗣瑗），誑以金陵三日響應，盜印電滇，蔡卽日宣布獨立，致敍州死義軍三千人。[28]

因爲雲南獨立的提早宣佈，使潛運軍隊入川的計劃完全暴露，袁氏急調精兵入川馳援，從容佈置，遂使護國軍陷入苦戰當中，幾乎不克自拔。

而任公託潘若海、胡嗣瑗代發的電報，是在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致出，係用任公與蔡鍔事先約定的密碼，由南京一等印電拍發。當蔡鍔等人收到之後，便確信任公已身在南京，馮國璋眞的就要響應，因此都興奮異常，準備立卽宣佈獨立。十二月二十三日，雲南方面遂由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及蔡鍔等領銜，致電袁氏，請其「立將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鈐、周自齊、梁士詒、張鎭芳、袁乃寬等（按均爲洪憲帝制禍首），卽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渙發明誓，擁護共和，則大總統守法之誠，庶可爲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國本可稍定，」並請袁氏「於二十四日上午十點鐘以前賜答。」[29]袁氏對這封雲南的最後通牒不予置覆，逾時，雲南遂召開大會於將軍府，滇省軍政兩界及士紳到會者四十餘人，蔡鍔、李烈鈞、戴戡、殷承鑾、熊克武、方聲濤、龔振鵬等也都蒞臨參加，由唐繼堯擔任大會主席。會中蔡鍔發言最多，並議決發電各事、共和軍（旋改名護國軍）的組織、及宣佈獨立日期等事，經全體一致贊成而告通過。[30]

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遂正式通電全國各省，宣稱獨立，推舉唐繼堯爲雲南都督兼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留守雲南，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率師征川，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領兵入桂。護國之役於茲揭開序幕。

間接影響廣西的獨立

雲南宣佈獨立後，任公一度有親自赴滇的打算，唐繼堯也迭電歡迎。祇是，局勢的演變不盡如任公的初衷，固然貴州在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通電獨立，加入護國討袁的行列，馮國璋却始終按兵不動，意態不明，蔡鍔率領三千餘護國軍征川，逐漸陷入苦戰之中，任公祇有坐困上海，憂心不已。當時的廣西將軍陸榮廷(字幹卿，廣西武鳴人)，雖早對袁氏心存怨望，却無響應雲南的決心。任公十分關懷廣西方面的動靜，五年一月十八日，任公曾寫信給陸榮廷，勸他舉兵討袁，[31]這是梁、陸最初的接觸，在此之前彼

[28] 吳天任編：**何翽高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民國六十一年出版），頁一四一。

[29] 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臺北，文海出版社，袁世凱史料彙刊本，民國五十七年初版)，頁一二四——一二五。

[30] 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影印，民國五十九年初版），第一册，「紀事門」，頁五九。

[31] 梁啓超：「致陸幹卿書」，**盾鼻集**，頁二二——二五。

此素未謀面，不過陸對任公仰慕已久，據陸的義子曾彥在五年一月初親口對滇軍駐滬代表李宗黃說：

> 陸幹老（陸榮廷號幹卿）雖然是一介武夫，椎魯無文，但是他老人家極爲尊重科甲出身的讀書人，再則便是遜清遺老，譬如現在上海的岑春煊，梁啓超等，都是他老人家素來最所欽敬的。先生到上海以後，不妨設法敦促岑、梁赴桂襄助，倘能如此，相信廣西獨立必易於實現，且能促其速成。[32]

當陸榮廷接到任公勸說他舉兵響應的信之後，便派陳祖虞至上海迎任公入桂，這件事任公在民國五年的「從軍日記」裏說：

> 當雲南首義之初，廣西之響應，久爲全國所期待，凡曾與陸幹卿將軍接者，共信其無變也，荏苒兩月，音響轉寂，於是漸或竊竊焉憂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書，將三千言，爲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吾與幹卿既未前識，且茲事苟非內斷諸心者，卽游說何由進，吾書不敢期於有效，盡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吳柳隅（按卽吳貫因）介見一客曰陳協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33]

但是陳祖虞來得太過突然，而陸榮廷也似乎很輕易地便允諾起兵，反使任公心生疑竇，任公的友好也都勸任公從長計議，因此任公婉拒了陳祖虞的請求。

三天之後，卽二月二十二日，陸又派廣西測量局局長唐紹慧（字伯珊）至上海，且携有曾彥的親筆函，先去見李宗黃(唐繼堯所派駐上海的代表)，然後一同去謁見任公，李宗黃回憶其經過說：

> 唐伯珊當我的面，向梁啓超先生備述廣西都督陸榮廷對梁氏仰慕之忱，禮聘之篤，我在一旁陪坐，眼見梁先生被唐伯珊說得眉飛色舞，喜氣洋溢，可是梁又故意以退爲進的說道：「陸幹帥興除利弊提綱挈領，他已使廣西全境爲之大治，又何須乎我去幫什麼忙呢？」唐伯珊眞不愧爲滔滔舌辯之士，他聽了梁任公的話，臨機應變當下便答道：「陸幹帥自詡頗有自知之明，他說他在廣西，充其量祇可肅清盜匪，保境安民，若論建設之任，還得任公前往施展長才」。這時候，梁啓超先生便側過臉來向我道：「伯英（按李宗黃字伯英）兄！陸幹帥一片誠心，着實令人感激，你說我是該去不該去呢？」有此可乘之機，我便斬釘截鐵的答道：『你當然該去』。於是梁啓超又追問一句：「何以故」我答得非常簡單：「任公先生志在討袁，志在護國，便爲了陸幹帥的這一句話，任公朝發，陸幹帥便立起響應護國義師，任公先生焉有不走這一趟的道理」。當下，梁啓超先生昂然地擡

[32]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臺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民國六十一年初版），第二册，頁一二四。

[33] 盾鼻集，頁一二一。

起頭來，他面現紅光，興奮莫名的說道：「好！我便到廣西去走一趟」。[34]

陸榮廷派人迎接任公入桂，雖然是出自他對任公衷心的仰慕，而廣西要人陳炳焜的從中牽線推薦(因陳炳焜曾與蔡鍔結拜爲金蘭兄弟)，亦居功至偉。[35] 再加上清末蔡鍔曾在桂服務五年，與陸既有共事之誼，且廣西軍界也多係蔡鍔的僚屬和學生，有了這層關係，任公的膽氣也爲之一壯。遂於三月四日由上海乘日船橫濱丸出發，同行的尚有唐紹慧、湯叡、藍公武、黃群、吳貫因、黃大暹六人。當時滬港間偵探密布，任公趁著黑夜偷溜上船，躲在艙底汽爐旁邊一間貯郵件的小房中，船外大雪紛飛，任公却揮汗如雨[36] 可見此行的艱苦。三月七日抵達香港，任公不敢登岸，與黃群仍留船上，而其餘五人上岸寄住旅館中。當初任公等人由滬南下時，聽說如果假裝爲外國人，則入海防可無須護照，及抵香港，而駐港法領事發佈新章，規定無論那一國人欲入海防，均須領有護照，每一護照且須有兩位殷實商家擔保，繳照片二張，並親蓋手模。於是任公等人繞道海防入桂的計劃遂面臨極大的困難。這時，廣州日本領事傳出消息，袁軍已攻克敍州，未幾，又傳袁軍攻克納溪，而龍覲光攻下劍隘，惡耗頻來，任公焦慮萬分，擬冒險經由廣東西江而入梧州，其餘諸人極力諫阻，遂決定任公無須護照，由黃群相伴，逕赴海防，相機繞道上岸。[37] 其餘五人則先後動身經廣東前往梧州。因此任公與黃群二人「服西服，冒稱日本人」[38] 於三月十一日夜祕密換乘日本三井洋行赴安南洪厓運煤的妙義山丸，十二日中午由香港啓行。

任公這次偷渡，完全託諸日人，日人的規劃十分周密，十五日晨舟抵洪厓，旅居海防的日商橫山，奉日政府之命來謁任公，旋卽回海防部署。當船將入海防港時，橫山以游船來接，任公等人乃轉赴游船，借夜色掩護登岸。而三月十四日湯叡已行抵廣西南寧，謁見陸榮廷。這時陸甫將在桂境的龍覲光所部全體繳械，與袁氏決裂，而不得不早日傳檄討袁，又知任公已在赴桂途中，遂於三月十五日正式宣佈獨立，其中致北京最後通牒電，致各省通電，皆署陸和任公兩人之名，這兩電都是任公事先預備好，由湯叡携帶至桂的。

廣西的獨立對整個政局的影響甚大，茲引李劍農的看法，以明其梗概：

> 廣西獨立的消息，一達北京，袁政府的慌亂，更不可名狀。因爲桂省既加入護國軍，則非徒粵桂聯合進攻滇南的計劃不行，就是粵省，也日趨危險，護國軍的範圍，就要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護國軍的範圍越擴大，滇、黔方面的勢力就越强

[34] 李宗黃回憶錄，第二册，頁一三五。

[35] 同註[27]，頁四七四。

[36] 梁啓超：歐遊心影錄（香港，三達出版公司），頁七五。

[37]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八三。

[38] 梁啓超：「從軍日記」，盾鼻集，頁一二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固，袁氏對付的計劃，就越沒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廣西的獨立，實給與滇、黔護國軍莫大的助力，對袁氏則爲莫大的打擊，洪憲的帝號，不久就要消滅了。[39]

同時，廣西的獨立，也使在四川艱苦作戰，瀕臨危境的護國軍在精神上獲得鼓舞，堅定了討袁的信心，在蔡鍔的指揮下，重新發動反攻，挽回了軍事上的頹勢。從此，滇、黔、桂、川聯成一氣，討袁的勢力由點而面，顯示出一般不可輕侮的勢力。三月二十二日袁氏下令撤銷制帝，廣西獨立當爲重要的因素之一。

當廣西宣佈獨立的次日（三月十六日），任公和黃羣已悄然進入海防，十七日晨橫山將二人送至海防附近的帽溪牧場藏匿，同日黃羣又由帽溪返回海防轉道入滇。任公則留在原處，枯候桂使來迎，一匿十天，荒山野地，食宿簡陋不堪，加以勞累過度，水土不服，以致疲病交加。這十天的生活使任公嚐够了痛苦的滋味。至三月二十六日任公才由帽溪啓程，次日抵達鎮南關，才算踏進廣西境內。三月二十八日抵龍州，四月四日入南寧，任公在給梁令嫻女士的信中，提到初抵南寧時備受歡迎的情形說：

> 初四日抵邕（原注：南寧，省城）陸督親至江口。（原注：率水軍全隊出迎）入城時軍民之歡迎狂湧，非語言所能形容，吾兩日間應接勞頓，無片刻息，故不能作詳函。[40]

綜觀任公自三月四日從上海出發，整整一個月之後，才能抵達南寧與陸榮廷晤面，旅途的漫長和艱辛，可以想見。至四月六日，廣東將軍龍濟光在廣東民軍紛起、四面楚歌的情況下，被迫宣佈獨立，暗中却仍與袁政府密電往還。四月十二日龍的部屬在「海珠會議」中譁變，槍殺廣西方面以及廣東民軍的代表湯叡、譚學夔、王廣齡、呂仲銘等人，使民軍與龍氏間的衝突益烈，兩廣合作討袁的前途也顯得困難重重。任公對好友湯叡的死難痛心至極，但爲了顧全大局，避免內鬨，祇好飲淚言和，居中調解。直到四月下旬，雙方才達成初步的協議，於是龍軍與廣東民軍間的戰事也轉趨沉寂。

籌組討袁各省的聯合機關

梁任公自稱他與蔡鍔在天津密謀討袁時，就已經議定俟雲貴兩廣獨立，觀形勢如何，即先組織一臨時政府，擁戴黎元洪爲總統。[41] 民國五年年初任公滯留上海時期，曾與滇軍駐滬代表李宗黃到這個問題，據李宗黃回憶說：

> 那一天梁啓超和我專關一室，促膝而談，他侃侃然申論「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大義，然後便倏然轉爲：「外國人間起護國軍討袁之役究由何人領導？設有何種機

[39]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臺四版），下冊，頁四四九——四五〇。

[40] 「民國五年四月六日與嫻兒書」，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冊，頁四八三。

[41] 盾鼻集，頁一四五。

構，令我們難以置答」的卑之無甚高論，末後梁氏方始點破了正題說：「當今之計，我們亟應設立一個總其成的機構，或者竟是政府組織亦好。護國討袁，對外則爭取外交同情，對內也有以號召全國軍民。」……，不過，當時我還是試探的問梁氏道：「梁先生的意思，是應該成立一個何種名義的機構呢？」他很快的答覆我道：「當今正值軍事時期，我想不妨先行成立大元帥府。推大元帥一人，統率全局。」[42]

當雲貴起兵後，最爲人所討論的是總統問題，馮國璋曾有反對帝制的趨向，於是上海民黨多謂如馮響應討袁，則舉馮爲總統，然馮始終默無動靜。南方民黨又以岑春煊於新舊人物皆能融洽，遂有擬舉岑爲總統者。在滇黔方面另有舉唐繼堯或蔡鍔爲總統的說法，異說紛云，莫衷一是。五年三月初旬任公由滬赴桂途經香港時，曾與舊國民黨的李根源等人磋商此事，任公主張仍當遵照國法，推黎元洪爲總統，一方面可以平息爭端；一方面明示護國軍的起事確爲擁護國體，並非爲爭權奪利。並謂將來舉事各省不可無聯合的機關，這種機關若以政治命名，恐怕會使未起兵各省疑爲組織政府，有壟斷政權的意圖，不如以軍事命名阻礙較少，即可名之爲「軍務院」，[43] 這就是軍務院的濫觴。

三月十一日夜，任公與黃羣（溯初）秘密換乘日船妙義山丸由香港啓程南行，準備從海防偷渡入桂。據黃羣記云：

> 任公在妙義山丸中起草護國軍軍政府宣言，上黎大總統電，致公使團領事團電，及軍務院布告等文，溯初則起草軍務院組織條例，經任公加入三字，是即以後所陸續公佈者也。[44]

是故，軍務院的構想幾乎完全出自任公一人。三月十七日任公與黃羣在海防附近的帽溪牧場分手，任公仍留原處等待桂使來迎，而黃羣則奉任公之命復返海防轉道赴滇，[45] 擬與唐繼堯籌商設立軍務院等事宜。黃羣約在三月二十日前後抵滇，與唐會晤，唐旋即致電任公，表示他的態度說：

> 溯初來，奉到手書，又計畫組織臨時機關各稿，詢之溯兄，沿途逆探甚多，旅行中異常困難，稿成於咫尺之艙房內，而乃計慮周密，眼光四射，如此眞可謂渺滄海於一粟矣，感急之餘，欽佩曷極。組織軍務院條例，誠爲過渡時代，不二辦法，均可照行，所尙待研究者，地與人之問題耳。現在成渝未下，我之範圍，只滇、黔、桂三省，究以何者爲合宜。撫軍長一職，究推何人爲適當。同人幾經研究，均尙未得正確之解決，仍懇先生與幹公切商提出，再徵求各方面意見，方能

[42] 李宗黃回憶錄，第二冊，頁一六五——一六七。
[43]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冊，頁四七七。
[44] 「民國十八年黃溯初記任公民國五年由滬入桂事」，同上書，頁四七八。
[45] 梁啓超：「從軍日記」，盾鼻集，頁一二六。

確定。人地既定，卽可着手組織，庶對內對外，得所依據，其便利莫甚焉。[46]

可見唐大致上已贊同軍務院的設立。三月二十八日任公已行抵廣西龍州，尙未與陸榮廷晤面，卽致電於陸說：

> 現在外交極順手，臨時政府一成，可望承認，超在滬港與各方面熟商，擬遵照約法，大總統缺位副總統繼任之條文，由現在之都督及岑、蔡、李與超公同宣布，恭承黎公依法繼任，並組一軍務院，用合議制，執行軍國重事，如此對外則有統一機關，承認可望辦到，辦法請就近問（湯）覺頓便悉，超來更面罄其詳。[47]

然由於廣東問題的紛擾，軍務院的計劃遂行擱置。至四月下旬，龍濟光、陸榮廷欲推岑春煊爲四省都司令，任公深恐引起滇、黔的不滿，致生分裂，乃於四月二十八日通電獨立各省都督（唯廣東龍濟光除外）、總司令商討設立軍務院等事宜說：

> 大約時局最終之解決，其一當視四省實力，其二當視外交，外交承認，略有成議，所以遲遲者，因統一機關久未成，而正式負責之人，今雖由四省宣言，舉黃陂（黎元洪）依法繼任總統，然未能親臨指揮，前奉黃公（唐繼堯）書，知軍務院組織，極蒙贊許，惟人地兩問題待商。竊意撫軍長一職，以滇省首義之勛勞，自非黃公莫屬，黔、桂、粵當無異辭，惟爲交通計，其地點似不能不在粵，黃公既不能來粵，擬增設副長攝職，推西林（岑春煊）任之。……但使軍務院告成，內部自能統一鞏固，迅圖發展。[48]

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正式宣告成立，推岑春煊爲都司令，梁任公爲都參謀，可以說是軍務院成立的先聲。

蔡鍔時在四川，對成立四省聯合政府之事頗不贊同，他認爲段祺瑞既出組內閣，馮國璋與陳宧復聯絡各省迫袁氏退位，並準備宣佈獨立，在這個時候實「不宜組織政府，尤無推舉首長之必要，致招爭權攘利之嫌，啓南北分裂之漸。」對於兩廣都司令部命李烈鈞、陸榮廷率軍分道北伐的舉動也甚爲不滿，他表示：「此間停戰各處紛來責言，南北兩方面背道而馳。」[49] 並且强調議組政府，推舉首長「實與現勢不協，吾儕既不贊許，何可更事效顰，況滇黔舉義以來，內外一心，上下一致，儘有意見之交換，不聞意氣之爭持，籌餉出兵，各盡所能，解衣推食，爭先恐後，有黃(唐繼堯)，周（劉顯世，貴州都督）二公主持於內。各軍將士乃能效命於外，苟繼此精神於不墮，敵虜雖强，不足爲慮，所稱統一機關云云，實無設置之必要。」[50] 待蔡鍔在接到任公所草擬的各件宣

---

[46] 前雲南都督府秘書廳編：會澤蕭燾文牘（雲南圖書館，民國六年石版），下册，「書牘」，頁一四。

[47] 梁啓超：「復陸都督電」，盾鼻集，頁三一——三二。

[48] 梁啓超：「致各省都督總司令電」，盾鼻集，頁四二——四三。

[49] 蔡鍔：「致陳將軍電」，見劉達武編：蔡松坡先生遺集（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一年初版）之四，「軍政文電」中，頁三八。

[50] 蔡鍔：「致唐劉兩都督戴總司令陽戌電」，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軍政文電」中，頁三九。

言書及軍務院條例全文之後，覺得任公「將大總統之推舉與軍務院之設立，移花接木，聯爲一貫，亦尚說得過去。」[51] 格於師生間的深厚情誼，蔡鍔遂不再持異議。

廣東將軍龍濟光雖於四月六日宣佈獨立，實無半點討袁的誠意，兩廣都司令的成立，純爲解決廣東問題，但龍濟光表面綏服，陰懷貳志，任公軍務院的構想雖獲滇、黔、桂各省的贊同，但以廣東方面一時尚無法協調，不得不暫爲擱置。五月四日，任公因馮國璋的電邀洽商大局，擬赴上海一行，當任公上船預備啓椗之際，日本太田領事忽然趕到，謂龍濟光極願與任公商量一切，凡可讓步的無不退讓，任公亦以廣東問題不生不死，對整個大局空礙極大，若有機會與龍面談，或能消除岐見，遂於次日(五月五日)偕同太田、李根源、張鳴岐、黃大暹等前往廣州。[52]

任公等人廣州之行最大的收穫，便是軍務院的設置終獲龍濟光的首肯，是以任公「旋卽通電全國，宣告軍務院成立。」[53] 然「除軍務院事外，他種條件龍皆拒絕。」[54] 並且龍手下的驕兵悍將對任公等人不假詞色，甚至意圖加害，據任公回憶說：

> 到第二天晚上，他（龍濟光）把許多軍官都聚起來，給我開歡迎會，個個都拖鎗帶劍如狼似虎的幾十人，初時還是客客氣氣的。啊啊！酒過三巡，漸漸來了，坐在龍濟光旁邊一員大將——後來我纔知道他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裏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漸漸罵廣西軍，漸漸連蔡公和護國軍都罵起來了，鼓起眼睛釘住我，像是就要動手的樣子，龍濟光坐在旁邊整勸少說話，我起初是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過後，我站起來了，我說：「龍都督，我昨夜和你講的什麼話？你到底跟他們說過沒有？我所爲何來？我在海珠事變發生過後纔來，並不是不知道你這裏會殺人，我單人獨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裏頭，我並不打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爲中華民國前途來求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爲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所以我拼着一條命來換廣州城裏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人格，既已到這裏，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便怎樣……」我跟着就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說了一點多鐘，據後來有在座的人說，我那時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個人，說我說話的聲音之大就像打雷，說我一面說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滿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當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軟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們的毒手，我氣太盛了，像是把他們壓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動，散席後許多位來和我握手道歉。[55]

---

[51] 蔡鍔：「致唐劉兩都督戴總司令陽亥電」，同上。

[52]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九一。

[53] 同上。

[54] 同上，頁四九二。

[55] 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九五——九六。

不過事情並未因此平息，據與任公同赴廣州的李根源說：

> 夜間以兵四五百人圍門外，喧囂叫罵，必殺余二人以洩其憤，龍氏兄弟避之觀音山，其幕僚則交接嘻笑，可謂譎之極矣。幸有張鳴岐、李國治、段爾源、張聯芳等盡力調解，送余兩人由後門步行出城，余自鎮靜如常，任公則通宵未寐，受驚不小。[56]

可見任公此行確是冒着很大的危險，所以當任公由廣州返回肇慶後，曾致電蔡鍔說：「鴻門惡會，僅乃生還。」[57] 並沒有浮詞誇張的意味。而軍務院院的成立，也迫使任公赴滬的日期向後推延，至五月十五日任公將軍務院各項事宜大致弄妥之後，打乘船離粵，經由香港轉赴上海。

關於任公軍務院的構想，完全表現在他所撰的護國軍軍政府連續五號宣言中，第一號是宣佈袁氏的叛國罪行，已失去大總統的資格；第二號是依法推戴黎元洪爲大總統；第三號主張以軍務院暫代國務院使職權；第四號爲軍務院的組織條例，第五號公佈軍務院人事。

軍務院組織條例共計十條：

第一條　軍務院直隸大總統，統一籌辦全國之軍機，並行戰事及其善後一切之政務。

第二條　大總統不能親臨軍務院所在地時，一切軍政民政，並對內對外之事項，以軍務院名義行之。

第三條　軍務院設撫軍，以其決議或同意行其權限之事，撫軍以各省都督，代理二省以上之都司令參謀，及各獨立省分現實之軍隊有二師以上之總司令等充任，新得前項之資格，卽有撫軍之資格，撫軍無定額。

第四條　軍務院由撫軍中互選撫軍長、副撫軍長各一員，撫軍長得撫軍之決議或同意施行事項，副撫軍長佐撫軍長協議處辦一切職務。撫軍長有事故時，由副撫軍長代理，正副撫軍長均有事故時，由撫軍中互選一員代理撫軍長職務。

第五條　軍務院設政務委員會，由撫軍中互選政務委員長一員，委員長以下設各種委員，分掌外交財政法制等各般政務，委員無定額。

第六條　軍務院設各省代表會，由各省都督各派代表二員應政務諮詢。

第七條　軍務院設祕書若干員，受正副撫軍長及政務委員長之命，掌管機密事項。

第八條　軍務院有對內對外特別事故時，由撫軍會議又經其同意得任命專使處理其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6] 李根源：雪生年錄（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民國五十五年臺初版），卷二，頁一二——一三。

[57] 梁啓超：「致蔡松坡電」盾鼻集，頁五一。

第九條　軍務院所屬各種委員會及各省代表會之細則，以院令另定之。

第十條　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廢之。[58]

任公的意思很明顯，袁氏既承認帝制，卽已失去民國大總統的資格，依照民國二年參衆兩院議決公佈的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的規定，應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爲大總統，今黎身陷敵人之手，無法就任，依法應由國務院代行其職，不過，國務院又非由大總統任命經國會同意後不能組織，爲權宜之計，乃暫設軍務院統籌大局，而現在值軍政時代，軍務院易「國」爲「軍」，庶覺名實相符，軍務院的撫軍長與國務總理相似，下有撫軍卽各省都督，參謀卽各師、旅長。代表會與立法院相似，委員會則如同各部理事之人。[59]這樣一來，軍務院不但不是非法的組織，反而成爲正統的賡續，任公這套說法實法絲毫破綻。並宣布「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廢之」，此一規定，在使帝制崩解後該組織不致爲他人利用，造成國家的分裂，其眼光的遠大，確令人贊佩不已。且軍務院的組織並不繁浩，規模亦不大，正因如此，日後取銷，才不會遭遇困難。另外任公倡言以黎元洪爲合法的繼承人一事，尤具慧眼，目的在杜絕其他野心人士的覬覦大位，致生爭端，動搖國本。且名正言順，明示護國軍爲嚴守國法的團體，在號召方面收到宏大的效果。

軍務院於五月八日正式成立，院址設在廣東省的肇慶舊端州書院內，[60]撫軍爲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呂公望(浙江都督)、岑春煊、梁啓超、蔡鍔、李烈鈞、陳炳焜、戴戡、羅佩金等人（按呂公望、戴戡、羅佩金係日後補列爲撫軍者），互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副撫軍長，另以梁啓超爲政務委員會委員長。[61]外交專使則爲唐紹儀，副使爲王寵惠、溫宗堯，以范源濂、谷鍾秀爲駐滬代表[62]李根源爲北伐聯合軍都參謀。[63]在軍務院組織條例中雖有各省代表會，惟以院址在肇慶，交通不便，故未嘗成立。

任公在被舉爲政務委員長及撫軍後，頗遭上海人士的攻擊，據吳貫因的記載：

> 軍務院未發表之前，梁任公本欲避去撫軍之職，因李印泉（根源）、章行嚴（士釗）極力勸駕，而滇、黔、桂、粵四省重要人物，亦以非得任公參列其中，不足以維繫民望，於是乃加都參謀爲撫軍之一項。及發表之後，滬上一部分人士大攻擊任公之爲撫軍，此消息傳至肇慶，章行嚴與李印泉乃貽書滬上，解釋任公之爲

---

58 梁啓超：「護國軍政府第四號宣言」，**盾鼻集**，頁九——一〇。

59 **護國軍紀事**，第四册，「紀事門」，頁一四。

60 李根源：**曙生年錄**，卷二，頁一二。

61 梁啓超：「護國軍政府第五號宣言」，**盾鼻集**，頁一〇。

62 同註 52。

63 同註 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撫軍乃由各方面極力敦勸，初非其本意也。方籌安會之發生也，其不慊於袁氏者，無論何派之人，皆望任公出而與袁氏反對，誠以欲轉移輿論，使國民知袁氏之不可托以國事，惟任公之鼓吹最有力也。及義師既興，南方之勢力稍稍足與袁氏相抗，於是向之欲抬任公於九天者，忽又欲擠任公於九淵，世途之險巇，一至於此，亦可畏哉！[64]

舊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的合作討袁，本係暫時的性質，倒袁之後則各有所懷抱。然在袁氏敗象初露之際，舊國民黨部分人士已經按捺不住，深恐倒袁後任公大權在握，對他們大爲不利，因而有此種排擠任公的行爲。

軍務院的主幹係由舊國民黨、進步黨，及西南軍系三大勢力結合而成，然反袁最力，迭在廣東及全國各地舉兵的中華革命黨，則被排拒而無一人參加此一最高的討袁組織。在軍務院成立的次日（五月九日），孫中山先生即發表「討袁二次宣言」，其中嘗有消弭黨派爭執，共謀討袁的表示：

至袁氏今日，勢已窮蹙，而猶徘徊觀望，不肯自歸於失敗，此固由其素性貪利怙權，至死不悟。然見乎倡義者之有派別可尋，竊疑黨爭未弭，覬覦其猜忌自紛，而不能用全力以討賊。殊不知閱墻禦侮，淺人審其輕重，而況昔之政爭已成陳迹。今主義既合，目的不殊，本其愛國精神，相提携於事實，見仇者雖欲有所快，無能倖也。今日爲衆謀救國之日，決非羣雄逐鹿之時，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殘外，凡百可本之約法，以爲解決。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藉者也。[65]

從中山先生此文的語氣看來，似乎對軍務院排拒中華革命黨的措施，頗爲不滿，野心妄人似指梁任公、岑春煊而言，不過，自此之後，中山先生逐漸變更昔日中華革命黨獨力倒袁的計劃，而主動與其他反袁勢力協調，如五月二十三日致電田桐、居正、朱執信等人說：

文回滬後已宣言與各方面協同一致，聲討國賊。此時袁逆負隅懸棧，而南方義軍勢力獨薄，各地方進行彼此不相協，則更使袁賊得間。請兄體察此意，一切事宜務求於討袁各派協同進行，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至於旗幟，雲、貴、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吾黨亦宜一律沿用，俾不致同一討賊之軍而有猜疑。[66]

同日並有「致岑春煊盼泯息內爭共起討袁電」，[67]也可見中山先生調和黨爭的苦心。至於軍務院方面的反應如何，因材料的限制無法確知，然由當時種種跡象顯示中山先生的調和意見，在各黨各派私心自用的情況下，並沒有收到大的效果。

---

[64] 「丙辰從軍日記」，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九二。

[65] 黨史會編：國父全集（臺北，民國五十四年初版），第二册，「宣言」，頁二二。

[66] 國父全集，第三册，「函電」(下)，頁二六二。

[67] 同上。

任公在軍務院成立後，一方面謀求外交上的承認，一方面促師北伐，任公的用意在極力顯示獨立各省的力量，使袁氏及居間調和的馮（國璋）、段（祺瑞）不敢輕蔑護國軍（軍務院的成立亦有表現討袁軍的團結一致，不肯與北方妥性的意味），方能使他們死心塌地接受軍務院所提的種種條件。所以五月十四日任公致電蔡鍔說：

> 今出贛之師，略可一萬，更當與浙合兵規閩，入湘桂軍已萬餘，海軍運動亦奏效，大勢可望一變。馮、段和議，雖難顯拒，然實力發展一分，則條件有利一分，此役結果，最低限度，亦須造成南北均勢，否則無以對死事先烈也。[68]

談和必須以實力爲後盾，取得主動的優勢，始克奏效。他認爲「北方望和平甚急，我却宜受之以緩」，目前的態度應該强硬，「僅認局部停戰，非袁已去國，不肯息兵，」然後「俟湘、贛、閩到手，海軍歸附，乃議善後，庶均勢局成，而共和得確實保障，」[69]這種看法是十分切合實際的。

調處護國之役的善後

梁任公於五月中旬離開廣西，二十日抵達上海，以便就近與馮國璋洽商，直到五月三十日任公始驚聞其父蓮澗先生已於三月十四日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因卽致電岑春煊等，請辭去本兼各職，略謂：

> 昨舍弟啓勳自港來，奔告先考之喪，聞變痛絕，方啓超甫匿港舟之日，正先考彌留在牀之時，朋好過顧大局，先既不以病聞，後復不以喪告。人倫慘變，前古未聞，皆超罪孽，積此殃報，進於國家無毫髮之補，退於古今爲至不孝之人，……所有撫軍都參謀，政務委員長各職，應請立予解除。[70]

此後任公便在上海居喪，不與聞國事。任公回憶當時「連華甫（馮國璋）也不便來和我商量了，過了二十多天，袁世凱氣憤身亡這齣戲算是唱完。」[71]護國之役雖因六月六日袁氏的病卒而告一段落，但它留下的善後問題甚多，都急待解決。任公既爲護國之役的發動者，又係南北雙方所欽敬推重的人物，按理極應出面維持大局，無奈迫於禮教，必須在滬守制，閉門幽居。然任公並非完全置國家前途不顧，他知道護國之役結束後，全國隱然有三種大的勢力存在，一是北方的袁系軍人，在袁氏死後，隱奉段祺瑞爲領袖；一是雄踞長江下游的馮國璋，挾未獨立各省爲後盾；再就是以軍務院爲首的滇、黔、粵、桂、粵、浙諸省。這三大勢力如能泯除爭權奪利的野心，協同一致，則局勢將可穩

---

[68] 同註[57]。

[69] 梁啓超：「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盾鼻集，頁五二。

[70]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九四。

[71]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文集之三十九，頁九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定下來，是故，他於六月七日分電段、馮，及獨立各省都督司令，促其速奉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72] 任公的强調推黎，固然是貫徹他一向的主張，另一方面却在鞏固黎的法定地位，以杜絕野心人士覬覦大總統的弊端。他知道段有唯我獨尊的念頭，所以在通電中同時也警告段「若別生枝節，則公將爲萬矢之的。」但整個北方都是段的勢力範圍，黎元洪在北京就職，孤孑無援，故任公對段又不得不心懷顧忌，六月八日任公致電黎元洪，請他「委段公組織新閣」[73] 目的卽在拉攏段氏，並安其心。

幾天之後，任公擬妥了全盤的善後辦法，電告獨立各省，一致進行。共有六項：(一)恢復舊約法，(二)召集國會，(三)懲治禍首，(四)撤還在南省的北軍，(五)廢將軍巡按官制，一律改稱都督，(六)雙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開善後會議，直接晤商。[74] 但是唐繼堯致電北京祇提出四項要求，並與任公的意見稍有出入，任公卽電唐，表示「尊電四項外，當加懲禍首、廢軍巡官制兩項。」懲辦禍首「爲初獨立時之要求，不容拋棄，且非此不能一新政界空氣。」按護國之役的目的係在討伐袁氏的帝制自爲，現袁氏已死，那班推波助瀾的帝制禍首仍安然自若，何能使天下人心服？如不予以懲處，難保下次不再發生類似的變故，所以任公對懲治禍首決不掉以輕心，但主張「不宜多事株連，庶反側易安。」[75] 這時黎元洪、馮國璋都曾電請任公移駕相商，任公均以居喪辭謝，而派周善培（孝懷）往南京，黃群赴北京，面謁黎、段與馮。進步黨一向與馮、段等北洋派頗有交往，與黎元洪的淵源尤深，舊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則否，所以進步黨人在護國之役結束後，遂負起了南北疏通調和的任務。固然進步黨頗思藉此在政壇上佔得一席之地，但對穩定戰亂後的局勢方面，亦有其不可抹煞的貢獻。任公雖閉門不出，却隱然是進步黨人進行調停活動的幕後指導者。六月十五日黃群由北京致電任公，報告黎，段對恢復民國元年舊約法及國會的態度說：

> 兩謁黎、段，首商舊約法及國會事，黎、段均主恢復，惟方法不同。黎欲逕以命令發表，段欲先令各省長官分知各該省舊國會議員，各舉代表三人□□，卽由旅滬議員團挈出限期到京會□議□□據以發表，二說迄未決定，群贊黎說。[76]

是段並無恢復民元舊約法及民二舊國會的誠意，段的擁黎，祇不過利用黎爲過渡人物，暫借黎爲傀儡，實欲集大權於一身；若恢復民元約法，則事事受國會的掣肘，對他獨攬大權的計劃妨碍極大，他自然藉詞推諉遷延。不過，恢復民元舊約法係軍務院成立宣言中的要項，任公與獨立各省對此決不退讓；故任公於六月十六日覆電黃群，表示「芝老

---

[72] 均見盾鼻集，頁五二——五四。

[73] 盾鼻集，頁五四。

[74] 盾鼻集，頁五七。

[75] 盾鼻集，頁五八。

[76]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九五——四九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段祺瑞字芝泉）主約法復舊，甚慰，惟各省派三議員代表解決，似可不必，且難辦到。[77]

至六月二十二日段始致電各省及岑春煊、梁任公、唐紹儀，略謂：

> 恢復元年約法，政府初無成見，惟以命令變更法律，後患不可勝言，三年約法，履行已久，歷經依據，以爲行政標準，一語抹煞，則一切法令將受動搖，故不能不再三審愼。[78]

也就是表示民三約法不能廢除。按民國三年改訂的約法係袁世凱據以走向獨裁的工具。其特點在捨棄責任內閣制而取大總統責任制，及擴大總統權限而縮小國會權限，[79] 當然不能爲任公等人所承認。於是任公電告段氏，申述「三年約法，絕對不能認爲法律。」否則根據三年約法，現任大總統將成非法，必須「開所謂金匱石室，別選元首。」而段現在所掌理的國務院，實「爲元年約法之機關」係「三年約法所未嘗有也。」如果段堅持三年約法，首先他自己國務總理的資格便成問題。[80] 任公這封通電從法理，既成的事實各方面逐一去抨擊段氏，義正詞嚴，鏗然有聲，使段無法狡辯。六月二十五日駐吳淞海軍第一艦隊及練習艦隊，由李鼎新、林葆懌（原第一艦隊司令）、曾兆麟（練習艦隊司令）領銜，發佈宣言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大總統保障共和爲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後，北京海軍部之命令，概不承受。」[81] 馮國璋也致電段氏促其迅復民元約法，段迫於正義，窮於實力，不敢再堅持前議。至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元洪下令恢復民元約法，並續行召集國會，定八月一日開會，這樣一來，黎才算坐穩了總統的大位。任公不僅是首倡推黎的人，同時在確保黎氏正位的過程中，也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黎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組織內閣，七月六日又申令劃一各省軍民長官名稱：在官制未定之前，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民政長官，改稱省長，但懲辦帝制禍首的命令却始終遲遲不下，當雲南起義時，曾電請誅楊度等人以謝天下，這些帝制禍首也就是世人所講的「十三太保」，即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貴、朱啓鈐、周自齊、梁士詒、張鎭芳、袁乃寬、顧鰲。袁氏死後，段祺瑞遲遲不肯捕拏帝制禍首，後見不能再事推諉，便於七月十四日請黎下令懲辦，禍首

---

[77] **盾鼻集**，頁五九。

[78] 游悔原：**中華民國再造史**（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民國五十七年初版），頁一四九——一五〇。

[79] 岑學呂編：**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一年初版），上册，頁一八六。

[80] **盾鼻集**，頁六四。

[81] 見上海商務印書館編：**東方雜誌**（臺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民國六十年初版），第十三卷，第八號，「中國大事記」，頁二。亦載護國軍紀事，第四册，「紀事門」，頁一三〇。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僅有八名，包括楊度、孫毓筠、顧鼇、梁士詒、夏壽田、朱啓鈐、周自齊、薛大可，均於事先從容遁去，往昔的十三太保竟有六人不在通緝之列，可見懲辦禍首亦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在申令懲辦禍首的同一天，唐繼堯等也宣告撤銷軍務院，這是在善後問題中一件極爲重要的措施，而任公斡旋之力最多，早在六月中旬唐繼堯等即有私電表示「但使約法規復後，芝老重組織臨時新閣，閣員得軍院同意，亦可先行撤銷，」梁任公極爲贊同。[82] 可見撤銷軍務院的讓步辦法，並不倡自任公（吳貫因則說係浙江都督呂公望的創議），但軍務院中對撤銷之事分贊成及反對兩派，各持理由，不能一致，任公迭電獨立各省從事勸說，七月一日任公並擬妥撤銷軍務院的布告，電送各撫軍等，促其用全體撫軍的名義，速由雲南拍發。然因意見尚不能融洽，加以撫軍分散在各地，輾轉通知必致牽延時日，所以七月十四日唐繼堯即以全體撫軍名義，發出撤銷軍務的通電。關於這件事，任公頗爲人所指責，然由當時的情勢看來，民元約法已告恢復，國會亦在明令召集中，段內閣名單也告產生，祇待八月一日國會召開予以同意之後，國務院便算正式成立。北京政府已逐一按照獨立各省的要求行事，護國軍的目的既達，若堅持原則繼續保有軍務院的名義，恐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影響南北的感情至鉅，任公審情度勢，乃毅然提前取銷軍務院，結束了南北的分裂。八月一日，國會正式開會於北京，各國務員也一一獲得通過，停頓三年之久的政黨活動又告如火如荼地展開。任公一方面派人到北方參與政治活動，一方面敦促蔡鍔繼續經營四川，以鞏固並發展進步黨的黨務。基於與袁世凱共事所獲得的經驗教訓，使任公深深領悟從事政治的改革，必須擁有穩固的地盤，以及不可輕侮的武力爲後盾，始克奏效。任公這種覺醒，早在他民國四年十一月從天津致函供職雲南的進步黨要人籍忠寅(字亮儕，時任雲南省財政廳長)、陳廷策（字幼蘇，時任雲南省政務廳長）等人時，就說得十分明白。他痛心疾首地檢討進步黨歷次失敗的癥結，是在於「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爲人所刼持，無時不爲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祇餘此區區片土（按指雲南），而人方日慫恿于其旁，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爲牛後，何以自存？」[83] 可見此時任公已看中雲南，欲發展爲進步黨的根據地。雲南宣佈獨立後，蔡鍔率軍征川，唐繼堯旨在保境安民，舊國民黨人士亦在雲南活動，迫使任公將目標轉移到天府之國的四川。故當蔡鍔領兵入川之初，任公便以「冀壯嚴此土爲國人覓一遺種」來鼓勵他，[84] 袁世凱卒後，任公又立即派遣黃毓前往北京與段祺瑞接洽，替蔡

[82] 梁啓超：「致蓼季常電」，盾鼻集，頁五八。
[83] 盾鼻集，頁二八。
[84] 盾鼻集，頁二六。

鍔活動四川督軍的職位，五年六月中旬，黃璽自北京致電任公，表示「段雖極許蔡，然得省目的現難達。」[85] 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因陳宧、周駿在川爭權交鬨，發表蔡鍔爲四川督軍兼巡按使，任公在是日致電蔡鍔唐繼堯等人說：

> 中央因陳、周交鬨，兩皆撤回，任松(坡)總轄軍民明令，日內便發，發時不管用何名義，似宜囫圇暫許，勿峻拒，徐圖應付。[86]

同時，任公更專電因病而萌退意的蔡鍔，提醒他當此重大關頭「能否退，應否退，尙當三思，」並認爲蔡鍔「僅喉病，當無慮也，」[87] 促他接受中央的任命。蔡鍔銜令後，遂以羅佩金爲前鋒，與周駿的部下連戰於資中、內江一帶，迭獲勝利，七月二十日周駿倉皇率衆遁走，護國軍（滇軍）在翌日進占成都，蔡鍔抱病兼程西行，七月二十九日抵達成都上任。[88] 不久，蔡鍔病情轉劇，勢必離川就醫，八月九日蔡鍔將川督交由羅佩金署理而由成都啓程東下，同年十一月八日，病卒於日本，年僅三十五歲。

當蔡鍔離川的時候，本有預定的計劃，將來由他本人主持中樞練兵事宜，川督一席內定由其同窗至交蔣方震(百里)接任，羅佩金、戴戡的署理川督，均係暫時的局面。[89] 憑蔣方震的才幹和聲望，以及他與任公間的深厚關係，必能控制川省作爲進步黨的根據地。但是蔣方震爲了料理蔡鍔的後事等因素，遷延至民國六年七月始行赴川，甫抵重慶，即傳來戴戡敗死的消息，川局已爲劉存厚等川人所把持，蔣方震布置在川省任職的得力助手張耀亭，也爲川軍所殺，蔣知大勢難以挽回，祇有黯然離川；總之，護國之役後，由於任公的居喪隱退、蔡鍔的英年逝世，使進步黨失却乘勢發展的良機，待蔣方震督川的計劃失敗，進步黨爭取地盤爲政治後盾的美夢也跟着幻滅。此後，任公在從事政治活動方面，仍得依附强權，仰人鼻息，而終不能有所作爲，也已不足爲奇了。

結　論

梁任公一生思想屢變，政治立場也時常流轉不定，難免遭致世人的詬病。不過，他的政治理想是不變的，清末他反對專制，民國他依然反對專制，他抱定的宗旨是要實現民權政治。爲了達到此一貫的理想，他不惜任何的遷就和犧牲，所以，民初他極力拉攏袁世凱，便是寄望袁氏能行民權政治，詎料袁氏專斷恣爲，蔑棄民意，竟圖變更國體，代以帝制，遂使一向妥協溫和的任公忍無可忍，毅然奮起討袁，揭開護國之役的序幕。

---

[85]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下册，頁四九六。

[86] 盾鼻集，頁六三。

[87] 同上。

[88] 鄧之誠：「護國軍紀實」，載史學年報二卷二期（北平，燕京大學歷史學會，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出版），頁八。

[89] 參見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民國六十一初版），頁六二。以及蔣復璁編：「先叔百里公年表」，載蔣百里全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年初版），第六輯，頁三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護國之役的成功，可說是舉國上下反袁勢力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就整個討袁大局的發展脈絡而論，任公無疑是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他對於護國之役的貢獻已盡如前述，讚美他的人固然很多，抨擊他的人也屢見不鮮。尤其是提前撤銷軍務院的措施，曾引起西南各省的交相責難，甚至冠以「陰謀家」的外號。不過，對他來說，這些誤解是無足輕重的，他所關心的祇是國家的前途；他堅信民權政治是世界潮流的所趨，是國家富强的根本；唯有安定的政府和社會秩序，才能逐步推行民權政治，振興國家。是以，當袁氏歿後，他悉心調處護國之役的善後，頗有助於時局的統一。

民國六年七月他又甘心捲入政治的漩渦，與段祺瑞合作，目標仍然是在實現他的理想。可惜那批官僚政客依舊不能接受他的指導，使國家走上正途，失望之餘，他祇有辭職而去，也從此結束了他那爲時雖短却令人緬懷再三的從政生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